

· 文献之窗 ·

关于胡适所藏百衲本《辽史》及其题跋

刘国宾

1997年岁末，笔者于国内发现一部百衲本《辽史》，其首册目录页之天头，题有一则关于涵芬楼影印元刻本（即“百衲本”）《辽史》版本问题的跋文，全文407字，文末署为：“胡适 卅一、十一、廿三夜 纽约”。笔者于惊愕之余，遍查胡适先生文集、手稿集以及有关先生行年著述研究等文献，未见有收入此文者，亦未见有曾作是文之记载。经多方考辨，笔者认定，这套《辽史》确系先生由美带回国内的个人藏书；其跋文乃为先生亲笔所题。今录其跋之正文，并附笔者考辨于后：

此本原版甚好，但补版多甚粗劣，错误甚多。例如本纪一，叶九、十，似是原版，其字体与涵芬楼藏元覆本《金史》最相似，其刻工名“士达”，即《金史》刻工“陈士达”（《金史》卷八），皆是证据。又如本纪二，页一，似也是原版，其刻工“原礼”即《金史》刻工“吴原礼”。但纪二，页二，就是翻版了，“原礼”二字刻阴文，“礼”字不成字。又如纪一，页四，页五，都是更晚的补版，字体绝不相同，错误很多。大概这部《辽史》本身就是一部百衲本，其中有元覆刻本，有早期翻刻本，有重刻本或补版。张菊生先生跋说，“以此刊本与北平图书馆所藏初刻《金史》相较，字体绝异，刻工姓名亦无一相合。而与涵芬楼所补之五十五卷（如上举之卷八）较，则字体相类，刻工姓名同者亦有四十六人。是此决非初刻无

疑。”菊生先生似认此本为一个本子。我以为此本至少有三四个本合并而成。其补版年代也许有很晚的。

胡适

卅一、十一、廿三夜

纽约

1. 文末系年与先生经历相合。文末系年“卅一”，即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），先生旅美中，仍以民国系年。考先生行年，1942年9月18日由华盛顿移居纽约，翌年1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，至1946年6月1日启程回国，任北平大学校长。在纽约期间，先生写了很多考证文章。以是可证，“卅一、十一、廿三夜 纽约”与先生行年及其时之治学方向相合。

2. 由其笔迹及文义可认定此文为先生手书。此文为毛笔行书、蝇头小字。笔者以先生青、中、晚年之手迹相较，可见跋文字迹无论从结体、笔顺、风骨上看，都与先生他文之手迹相合：其中有四十余字，尤其“胡”字，与他文毫无二致；其他字的偏旁部首与先生手稿之字迹写法相合。虽然如此，笔者仍反诘：所见《辽史》上的跋文，能否为他人临写先生之文稿，抑或为伪托之作？笔者先由书法力学角度揣度，可见此手稿之行笔筋力劲健，富有书卷气，不仅品位不俗，且恰为人当中年真气充盈、运腕游刃而处世从容时所书，恰与先生移居纽约后之年龄、心境相符；又，其行笔气势连贯，无模写中辍笔观摩之“气泄”处；尤其引人注意的是，文中改动者有15处之多，这些地方亦看不出描摹迹象。更重要的是，其文对《辽史》版本问题所论之精深，虽时过半个多世纪，而至今仍无出其右者；特别是15处改动，其所炼字句掷地有声！此皆足证，其文绝非他人复制或伪托。

3. 这部《辽史》系胡适先生个人藏书。观全书16册之纸色、装订皆统一无二；除第16册之封底有破损外，余皆完好；出厂检验者章均为“赵”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整部书为原装，无一配补之页、

册。书中无一方公私印章；无藏书编号；书中多卷业经圈点，且不时有纠误、系年考订及简短评语，其笔体，与跋文同。又，以胡适先生之为人，断不会在他人或图书馆藏书上圈点作跋，更不会携裹非自家之书以归国！由上诸点，笔者断定，此整部16册百衲本《辽史》，乃为胡适先生旅美期间所批阅的自家藏书无疑。其目录页之跋文，当为先生将此书与百衲本《金史》（按，即以北京图书馆元至正刊本影印，以涵芬楼元覆本配补）中所配补的元覆本之版本相较后而作。先生1946年6月回国时，当携是书相随，终使之留于大陆。想其当时所用之百衲本《金史》，倘亦为自家藏书，或许也有跋文之类留于其上。叹不知其书今在何处。

岁月流逝五十六年矣，今录是文以告于海内外学人，无限感慨系之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

黄宗羲年谱释疑的一份重要史料

季学原

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刊行的《黄梨洲先生年谱》家刻本，是黄宗羲七世孙炳堃用20多年工夫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，历来受到学界珍视。但其中的康熙二十七年条称：“五月，之吴门，晤汤文正公潜庵（斌）……”学者历来质疑颇多，花费了不少考证工夫。

近读清人萧穆（字敬孚，安徽桐城人）的《敬孚类稿·跋黄梨洲先生年谱》，始知上述问题，萧穆早已考释得十分清楚，不必再存疑问。兹录其全文如下：